

FUDAN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3

复旦哲学评论

◎ 第3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FUDAN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3

复旦哲学评论

第三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复旦哲学评论.第3辑/孙向晨,孙斌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280-3

I. 复... II. ①孙...②孙... III. 哲学—文集

IV. 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781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装帧设计 杨钟玮·槐树设计

复旦哲学评论

(第3辑)

本辑执行主编 孙向晨 孙 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5 插页 1 字数 347,000

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7-208-06280-3/B·524

定价 39.00 元

学 术 顾 问 (按姓氏笔划排名)

王雷泉	冯 平	孙承叔	刘放桐
吴晓明	余源培	张庆熊	张汝伦
陈学明	俞吾金	黄颂杰	

本辑执行主编 孙向晨 孙 斌

目录

论文:

道学三题

..... 徐洪兴(1)

道家哲学的道言观之再思

..... 邓绍光(24)

晚读《中庸》:对《中庸》首章的现象学解读尝试

..... 柯小刚(35)

陈那与四种现量

..... 姚治华著 余振邦译(56)

以《量处轻重仪》为例略说道宣律师之义学

..... 陈怀宇(78)

还原与发明

——欧美佛教研究的方法论困境

..... 李四龙(91)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单子论

——对莱布尼兹之“单子”概念的承接与转化

..... 罗丽君(119)

敬重与本真存在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敬重说的诠释

..... 孙筱苓(142)

Epimeleia、Cura、Sorge

——海德格尔“操劳”概念源流考释

..... 韩 潮(161)

从“源始时间性”到“在场状态”

——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及其意义

..... 刘小龙 陈天庆(178)

谈“哲人王”理想中“知”的问题

..... 林美茂(194)

人的本性与公民教育

——维柯早期教育哲学研究

..... 张小勇(213)

通过自由而给予自由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

..... 戴 晖(227)

肉身主体的灵性生存

——试论克尔凯郭尔的主体性概念及其与黑格尔之区别

..... 陈涯倩(238)

别一种思辨能力:算计与礼物

——分析德里达的真假观念

..... 尚 杰(253)

后现代思潮是保守主义吗? 对哈贝马斯的一些响应

..... 刘国英(277)

书评:

谈谈《美的现实性》

..... 郑 湧(291)

思想短论:

自然与必然管窥

..... 陈嘉映(308)

译文：

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 G. A. 柯亨著 陈 伟译(312)

对话：

个人自主与相互依存：自由主义与儒家的对话

..... 贝安德、范瑞平著 曾誉铭译(324)

编后记

..... (348)

稿例

..... (349)

稿约

..... (350)

道学三题

徐洪兴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考订“道学”、“理学”、“宋学”和“新儒学”之名的历史演变、内涵外延及学界对它们的用法。认为对这些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名称,只要辞不害义,又不致产生误解,就不必强求划一。但比较而言,若论述范围仅限于两宋,以用“道学”为好;而若涉及宋明,则“理学”或更合适一点。其次讨论了道学思潮中的流派,着重论述了如何在思潮的视域下考察北宋道学兴起时的流派问题。最后论述了道学思潮的主题及其形成过程。认为道学思潮的兴起实质上是儒家思想对佛道二教挑战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道学思潮的内外任务规定了其主题,“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的教育宗旨“明体用之学”,无意中点出了道学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到胡瑗弟子程颐那里终于形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完整表述。本文具体分析了“明体用”何以就是道学思潮的主题。

一 关于“道学”之名

学界对宋明间持续近七百年的思想学术主流,历来有多种称法,或“道学”,或“理学”,或“宋学”,或“新儒学”,不一而足。以时间顺序言,“道学”之名出现最早,北宋时期已有运用;“理学”之名稍晚,南宋时期才开始使用;“宋学”之名首出于明代,普遍使用却在清代;至于“新儒学”之名,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出现的概念,后主要在海外和我国港台学界运用较多,只是近二三十年来才在内地部分学者的论著中出现。以上这些概念交叉重叠,学者往往根据自己理解或习惯使用它们,有时不免引起一些混乱。下面我根据这些概念出现的时间顺序,对其略作考释。

一、“道学”

据目前所知,“道学”一词首见于《礼记·大学》:“如切如磋,道学也。”这个“道”训为“言”,“道学”即论学、研讨学问。

东汉王充《论衡·量知篇》中有：“文吏笔札之能，而治定簿书，考理烦事，虽无道学，筋力材能尽于朝廷，此亦报上之效验也。”此论儒生与文吏之优劣，其中的“道学”指儒学，即儒生传习“先王之道”的学问。

《隋书·经籍志》“子部”中说：“自黄帝以下，圣哲之士，所言道者，传之其人，世无师说。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自是相传，道学众矣。”这里的“道学”指的是诸子中道家一派。

道教兴起后，道教徒也用“道学”之名。清儒毛奇龄在《辨“圣学”非“道学”文》中考证，“道学”概念是道教徒先用的，后来周敦颐、二程、朱熹等把它改作儒家的概念。^①毛奇龄的说法虽不无根据，但其结论认为宋儒把道教之学变为儒家之学则未必正确。

南宋末的周密，在其《癸辛杂识》中引吴兴老儒沈仲固言曰：

“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②

元祐(1086—1093年)是北宋哲宗的年号，淳熙(1174—1189年)是南宋孝宗的年号。从历史事实来看，这个说法只能算大致之言，并不精确。因为早在元祐之前，已有一些学者使用“道学”之名了，如张载曾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③张载卒于熙宁十年(1077年)，早于元祐。此外，二程兄弟在元祐前亦说过“道学”一词。^④

今人姜广辉认为，宋儒使用“道学”概念是从中唐韩愈倡儒家“道统论”引起的，而首先使用“道学”一词的是北宋中期的王开祖。^⑤依据是南宋中期永嘉学者陈谦在追述“永嘉学派”先驱、北宋王开祖的学业时说的一段话：

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未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王开祖)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不幸有则亡之叹。后四十余年，伊洛儒宗始出，从游诸公还乡相授受，理学益行，而滥觞亦有自焉。

① 详毛奇龄：《西河集》卷一二二《辨“圣学”非“道学”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道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69页。

③ 《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49页。

④ 按：《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东见录》中记：“尧夫(邵雍)豪杰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尝戏以乱世奸雄中，道学之有所得者，然无礼不恭极甚。”《东见录》是吕大临在张载歿后于元丰二年(1079年)东见二程兄弟受学时所记，亦在元祐之前。

⑤ 参见姜广辉：《宋代道学定名缘起》，《中国哲学》第15辑，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

陈谦明确提出“道学”二字由王开祖“倡鸣”，证据是他引王氏《儒志编》末章中的话：

由孟子以来，道学不明，吾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吾畏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⑥

按陈谦之说，北宋道学由王开祖“开山”，复由“伊洛儒宗”即二程“洛学”传播。这个说法是否准确这里不展开讨论，唯其说及引语有可注意者有二，其一，所说（或曰王开祖说）的“道学”，是指儒家尧、舜、文、武到孟子的“道统”之学，而非专指学派；其二，所说的话中“理学”一词有二见，它似乎才是指宋代学术系统的。

在北宋诸儒中，使用“道学”一词较多的应是程颐。程颐称其兄程颢之学为“道学”，这在《二程集》中屡见，如：“家兄学术才行，为时所重……其功业不得行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家兄道学行义，足以泽世垂后”^⑦等。程颐还一直认为他与其兄的学问是一致的，“吾之道盖与明道同”，^⑧所以言其兄也是“夫子自道”，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⑨程颐所说的“道学”，也还没有明确特指某一学术系统或学术流派的意思，其主要含义是“传圣人之道的学问”，如他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⑩

这里值得重视的是程颐把“道”与“行”和“学”与“传”的分开解说，前者以周公为下限，后者以孟子为下限。对此，南宋李心传在其所编有关早期道学文献《道命录》中有一解释：

道即学，学即道，而程子异言之，何也？盖行义以达其道者，圣贤在上者之事也；学以致其道者，圣贤在下者之事也。舍道则非学，舍学则非道。故“学道爱人”，圣师以为训；倡明道学，先贤以自任，未尝歧为二焉。^⑪

这是说前者重在圣贤之在位者，后者重在圣贤之不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道”，

⑥ 《儒志编·附录·儒志先生学业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03页。

⑧ 《二程集》，第346页。

⑨ 《二程集》，第643页。

⑩ 《二程集》，第640页。

⑪ 李心传：《道命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山东：齐鲁书社，1996年。

不在位者只能“传其学”而“以致其道”。所以“行道”偏重于政治，“传学”偏重于学术，而实质上两者相通。这个意思在程颐那里确也可以找到证明，如他在《上太皇太后书》中就曾说：“儒者得以道学辅人主。”^⑫余英时在其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对朱熹的“道统”和“道学”概念提出新解，并指出其渊源即出自程颐表其兄墓的那段话，其说甚是。^⑬至于程颐所谓“传圣人之道的学问”，也就是“儒者之学”，其特征在于“趋道”，如其曰：

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⑭

二程之后，在程门弟子的作用下，“道学”之名渐渐具有专指以二程为代表所倡导的学问之义，这使得“道学”一词又成了特指某一学术系统或学术流派的名称。这其中，朱熹的作用最为重要。

仅就名称而言，朱熹所说的“道学”还是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道学”，泛指古代圣贤相传的儒家精神传统，如其在《中庸章句序》中说：“子思子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⑮而狭义的“道学”，则专指继承儒家精神传统以二程“洛学”为主干的思想体系，如其在《程氏遗书后序》中说：“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⑯但总的说来，朱熹还是偏重于在狭义范围内使用“道学”之名。朱熹向以“道学”传人自任，他于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编《伊洛渊源录》，专记北宋以来道学传承源流，奉二程“洛学”为正宗，不仅记二程言行最详，且程门的历代弟子，即使无甚大影响者，亦具录其姓名。朱熹晚年还常用“吾党”一词来表述他们的这一学术传承谱系。^⑰正因如此，在孝宗淳熙年间，因

^⑫ 《二程集》，第542页。

^⑬ 按：余英时以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为据，认为在朱熹那里，“道统”和“道学”是不同的，即以尧舜至文武为“道统”之传，而以孔、颜、曾、孟为“道学”之宗。“道统”和“道学”也被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上古圣王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特征是内圣外王合一；而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分裂，孔子开创“道学”，专注于道体和内圣的学问。（详《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篇“绪说”之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7—35页）余先生之论，发前人所未发，可资参考。

^⑭ 《二程集》，第187页。

^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

^⑯ 《二程集》，目录第6页。

^⑰ 参见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按：程颐也用“吾党”一词，如其论及王安石“新政”时说过：“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二程集》，第28页）但他远没有朱熹用得那么频繁。

朝廷政治斗争而引发了一股反道学的浪潮,^⑮“道学”之名成为反对派攻击朱熹一派的口实,至宋宁宗庆元(1195—1200年)年间还一度被定为“伪学”。狭义的“道学”之名遂流行开来。

南宋后期,道学开始为官方所接受,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到元脱脱修《宋史》,在“列传”类中特意新辟了《道学传》,于是“道学”之名正式有了学派的意义。《宋史·道学传》基本上就是以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界定来收列人物的,即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为主线。这样一来,“道学”所指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它成为专指学界习称的“程朱”派的“理学”而不及其余。

不过,学界并没有完全遵从《道学传》的这一说法。许多学者言及“道学”时,不一定仅指“程朱”派的“理学”。如冯友兰就一直称“宋明道学”,而不称“宋明理学”,他还专门为此写过辨析文章。^⑯冯先生把“道学”规定为“本来是一个时代思潮的名称”,它不仅指“程朱”派“理学”,也包括“陆王”派的“心学”。在此意义上,它又成为与南宋开始流行起来的“理学”之名相通了。

二、“理学”

“理学”之名,也非自宋代始,两晋南北朝时的佛教徒就曾用“理学”来指称佛教中的义理之学。如东晋的佛教徒宗炳称后来被尊为净土宗初祖的慧远:“远和上(尚)澄业庐山,……高洁贞厉,理学精妙,固远流也。”^⑰

自南宋开始,“理学”逐渐被用来指称从宋代开始形成的新的儒学形态。前引陈谦语即是例证之一,类似的说法在南宋人中实有不少,我仅以陆九渊为例。陆氏尝言:

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以至于唐,曰师、曰弟子云者,反以为笑,韩退之、柳子厚犹为之屡叹。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⑱

^⑮ 按:最初上疏反道学的是当时的吏部尚书郑丙,他提到:“近世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元学案》卷九十七《庆元党案》)此疏所上时间,史家多笼统系于淳熙十年之后,今人束景南考证当在淳熙九年(1182年)十一月(参见束著:《朱子大传》,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此后有一批人纷纷上疏反道学,如陈贾、林栗等。

^⑯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9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又《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载《论宋明理学》,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⑰ 《弘明集》卷二宗炳《明佛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

^⑱ 《陆九渊集》卷一《与李省幹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页。

这里可以发现,陆九渊也是把先秦儒学传统称作“道学”(“学绝道丧”),而“本朝”则称作“理学”。

南宋人何以称先秦儒学为“道学”,而称本朝儒学为“理学”?虽无人做过解释,但我以为,朱熹对“道”与“理”字义的分疏可作为一种参考的解释。朱熹说过:

道是统名,理是细目。

问:“道与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问:“如木理相似?”曰:“是。”问:“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②

按朱熹的解释,似乎“道”是作统称来讲的,而“理”则是作具体来讲的。或者说,前者是总持地讲,后者是分解地讲。“道”与“理”的字义本就十分接近,有时往往可以通用或连用。如朱熹批评前人文字即是一例,云:“理学最难。可惜许多印行文字,其间无道理底甚多,虽伊洛门人亦不免如此。”^③当然,对“理”字之得名、二程兄弟“理”字之取义,朱熹有自己的解释,^④此不具论。总之,从“道”与“理”字义相近这一点看,“道学”与“理学”似也可作如是观。

从明代始,“理学”成为指称宋代流传下来的思想学术系统的通行概念。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⑤黄氏此说既包括程朱派,也包括陆王派,这个用法沿用至今。

如进一步言,“理学”之名还有学派和性质两层的狭义、广义之分:

以学派言,狭义的“理学”仅指“程朱理学”,这与二程与朱熹都以“理”作为自己最高哲学范畴有关;稍广一点,既指“程朱理学”,亦指“陆王心学”,这是明代以来的传统说法。当代学者还有更广义的解释,那就是除了程朱、陆王两大派之外,还包括“气学”(以张载、罗钦顺、王夫之为代表)和“数学”(以邵雍为代表)、“婺学”(又称吕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和“湖湘学”(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等。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理学应当包括北宋中后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和以苏

② 《朱子语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9页。

③ 《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第1485页。

④ 按:朱熹认为,“理”得名于《庄子》的“庖丁解牛”(见《朱子语类》,第3000页);二程之“理”概念,取义老子的“谷神不死”、“玄牝”等思想(见《朱子语类》,第2995页)。

⑤ 《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轼为代表的“蜀学”。^{②⑥}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应该说与对“理学”性质理解的不同有关。

以性质言,狭义的“理学”专指“性理之学”,它与哲学的关系较大,即着重探究“理”、“气”、“心”、“性”、“命”之类概念范畴的学问,有时也称作“心性之学”。广义的“理学”,则指“义理之学”,它与儒家经学有关,指有别于汉唐儒生治经所注重的章句训诂之学,旨在寻求儒经中大义和道理的学问。南宋末的黄震在其《黄氏日钞》中屡次提及“理学”:

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诂训。^{②⑦}

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瑗)、泰山孙先生(复)、祖徕石先生(介),始以其学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②⑧}

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之根柢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②⑨}

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之学,重在“义理”而涉及“性理”者殊少,二程伊洛之学则重在“性理”。黄震所谓“理学”,就是兼指“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的。据黄震之言可推出三点结论:其一,“理学”就是“脱去诂训”的“义理之学”;其二,“义理之学”涵盖“性理之学”,“性理之学”则为“义理之学”精髓(“至伊洛而精”和“以程先生为之宗师”);其三,“义理之学”早于“性理之学”出现(从“三先生”到“伊洛”)。

在南宋时,“理学”既可指“义理之学”,也可指“性理之学”,还可以两者兼指,即两者可互通。如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朝廷议张栻谥号,太常博士孔炜说张栻,“钟美萃灵,英特迈往,亲承忠孝之传,讲切义理之学”;权考功郎杨汝明复议,“公以尧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沉溺,以孔孟性理之学,起一世膏肓”。^{③⑩}这里的“义理之学”与“性理之学”实际上是同义的,可以互相替换。

明代开始,“理学”逐渐偏向于专指性理之学,但上述兼容性仍然存在,如清

②⑥ 如侯外庐先生就把二程之学称之为“道统心传式的理学”,把王安石之学称之为“新义式的理学”,详《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36、441页。

②⑦ 黄震:《黄氏日钞》卷二《读论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⑧ 《黄氏日钞》卷四十五《读诸儒书》。

②⑨ 《黄氏日钞》卷九十一《跋尹和靖家传》。

③⑩ 李心传:《道命录》卷八,孔炜《南轩先生张宣公谥议》、杨汝明《复议》。

代“学宗程朱”的“桐城派”学者,把“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作为学术的三个层面,这里的“义理”主要是指程朱的“性理之学”,亦即以“义理”涵盖“性理”。再如当代港台的“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四人联名所撰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论及“心性之学”时指出:“此心性之学,是中国古时所谓义理之学之又一方面,即论人之当然的义理之本原所在者。”^①这个表述是准确的。

三、“宋学”

以朝代之名来指称宋明间思想学术的“宋学”之名,是清代开始出现的流行概念,为考据学家所习用。亦有人将其与“道学”、“理学”概念相混用。

据目前所见到资料,明代嘉靖、隆庆(1522—1573年)间唐枢的《宋学商求》一书,^②最早使用了“宋学”这个名称。书中论及“横渠之学”、“明道之学”、“伊川之学”、“金陵之学”、“涑水之学”、“魏公之学”、“乖崖之学”、“安定之学”、“希夷之学”、“云溪之学”等,大抵泛指宋代学者的学术,并不特指思想,更不包括两宋之后的思想学术。

严格意义上的“宋学”概念,是由清儒提出来的。而在普遍意义上使用“宋学”之名的,则主要是有清一代那些考据学家们。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中论及清初经学时说:

国初诸家,其学微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从上可知,清代的考据学家们是把“宋学”作为与“汉学”相对的一个概念提出的。清嘉庆年间,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而道光年间方东树则著《汉学商兑》加以反驳。从此以后,“汉学”和“宋学”之名在学术界比较广泛地流行起来。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学者使用这对概念,尽管在理解和用法上存在一定差异。

清儒所谓“汉学”和“宋学”,究其旨义大致是:他们把两汉至唐代(尤其是东

^① 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7页。

^② 见《木钟台全集》初集,清咸丰六年(1856年)唐氏书院刊本。

汉延续到唐初的古文经学)的学术称为“汉学”,而把宋元明三朝的思想学术主流名曰“宋学”。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分,是因为他们认为,“汉儒专言训诂,宋儒专言义理”。^③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考据学家们,自认为他们所做的学问就是纯粹的“汉学”,^④在治学旨趣上迥异于“宋学”,因此高标“汉学”而贬低“宋学”。反之,“学宗程朱”、善写文章的“桐城派”文士,则竭力为“宋学”辩护而详举“汉学”之弊。于是,就有了清代的“汉宋学之争”和“汉宋兼容”的说法及倡议。

关于“宋学”的含义,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和用法:

第一种的理解和用法比较宽泛,但其时间跨度比较短。它专指两宋三百余年间的学术文化之全部,大致包括今天所讲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科技等在内。如前引明代唐枢的《宋学商求》,以及现当代的一些研究宋史的学者。^⑤

第二种的理解和用法比较普遍,其时间跨度也比较长,而其所指则比较专门。即专指在中国经学史或中国学术史上,与汉唐训诂之学、清代考据之学不同的宋元明清时期的义理之学。如前述清代的考据学者,以及现当代的一些研究经学史、学术史的学者。

第三种的理解和用法也比较普遍,它主要是从哲学史或思想史上来讲的。即指流行于宋明期间的思想学派,包括程朱的“道问学”和陆王的“尊德性”之学,以及张载等的“气学”、邵雍等的“象数学”、吕祖谦、叶适、陈亮等的“浙东之学”等。在这个意义上,它又大致与“道学”、“理学”这些概念相通。

四、“新儒学”

“新儒学”,英文是 Neo-Confucianism,^⑥也有人称“宋明新儒学”,以有别于

^③ 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伍崇曜跋语,《汉学师承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31页。

^④ 清代“汉学”实质上已与两汉经学有很大区别,并非如其自我认可的那样。此点龚自珍早已指出,以后章太炎《清儒》、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及近世的不少学者,都有过具体的阐释。

^⑤ 详邓广铭:《略谈宋学——附说当前国内宋史研究情况》,《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⑥ 按,一般认为,“Neo-Confucianism”是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在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用的英译。卜德之译固然在英语世界影响甚大,但“新儒学”一词的西文(不限于英文)要出现得更早,在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中就已出现,以后也不鲜见(详日本学者吾妻重二《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中译载于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29页)。

现当代出现的“新儒学”。

“新儒学”之名,最先是由冯友兰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使用的一个名称,^⑳陈寅恪在该书的《审查报告》中也运用了这个名称。^㉑1952 年陈先生发表《论韩愈》一文,^㉒仍沿用此名称。但此名称以后在大陆学界并不通行,主要是在海外学界较多地被沿用。20 世纪 80 年代后,“新儒学”之名在国内部分学者的论著中也开始出现,这与改革开放,中外学术交流的增广有关。

至于“新儒学”之名的含义,按通常的理解,乃是指称宋代开始出现的有别于先秦原儒、汉唐经儒的一种新的儒学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新儒学”所指等同于传统所称的“道学”或“理学”,如冯友兰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所说的:“宋明道学家,即近所谓新儒家之学。”^㉓

对“新儒学”之名的含义,当代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曾有过较独特且较具体的论述。1963 年牟先生在香港大学讲授《宋明儒学综述》时说:“其新之所以为新乃在自觉地发挥与锤炼‘内圣之教’,‘人的德性完成之教’,其最高目标是‘成圣’。”^㉔后来他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又提出,宋明儒之所以可称为“新儒学”,就外部认识而言有两点:一是“对先秦之庞杂集团、齐头并列,并无一确定之传法统系,而确定出一个统系,藉以决定儒家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因而为新”;二是“对汉人以传经为儒而为新,此则直接以孔子为标准,直就孔子之生命智慧之方向而言成德之教以为儒学,或直相应孔孟之生命智慧而以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以清澈自己之生命,以发展其德性人格,为儒学”。就内部客观内容而言亦有两点:一是就《论语》、《孟子》、《中庸》、《易传》而推进一步,这是调适上的新;二是就《大学》所表示的新,尤其是程颐、朱熹将重点落在《大学》,以其所理解的《大学》为定本,则转成与先秦儒家本义不同的、另一个系统,这是“歧出之‘新’”,“宋明儒学中有新的意义而可称为‘新儒学’者实只在伊川、朱子之系统。”^㉕晚近以来,

⑳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这是商务印书馆 1944 年增订版的简体字版)。

㉑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50 页。

㉒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28 页。

㉓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 197 页。

㉔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7 页。

㉕ 详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台湾:正中书局,1968 年,第 11—19 页。